

第一輯

任愛君 主編

契丹學研究

契丹學研究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契丹学研究

第一辑

任爱君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丹学研究. 第1辑 / 任爱君主编.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ISBN 978-7-100-17182-3

I. ①契… II. ①任… III. ①契丹—民族历史—中国—文集②契丹—民族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K28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43948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契丹学研究

第一辑

任爱君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7182-3

2019年6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9 3/4

定价: 78.00元

发刊词

《契丹学研究》是目前首部以专门研究契丹辽文化及其资源转化为主的学术集刊，是辽史学界及辽代考古与契丹文字研究的一块亮丽园地。

内蒙古赤峰地区是契丹民族的发祥地，也是10至12世纪契丹辽王朝历史发展的策源地和根据地，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地位。辽代的首都上京和中京以及辽祖陵、怀陵、永庆陵、永兴陵、永福陵等帝王陵墓都集中分布在赤峰地区。现在由赤峰学院契丹辽文化研究院主持发起这项旨在推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发轫之作，实属兼具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的便利条件。

集中力量编撰和出版这样一部汇聚契丹辽文化及其相关研究的专门化程度较高、学术性很强的集刊，无疑也是当前学界所期盼的一项“善举”和一段佳话！值此出版发行之际，诚心希望：一是集刊的编撰出版者们深刻体会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秉持求真务实的精神，坚决捍卫学术的纯洁性和严肃性，将这份艰苦的服务工作坚韧不拔地干下去。成绩就是干出来的。要始终秉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信念，使《契丹学研究》真正发展成为值得学界恒久纪念的“功德”，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使命不懈奋斗！二是诚心呼吁学界前辈和同仁们，应该像关心自己的事业一样，来共同呵护和帮助《契丹学研究》这株幼苗的成长，要踊跃向集刊提供高质量的稿件，并共同期盼它能够成为学界同仁集体的“庇荫”。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刘凤翥

2018年10月25日

目 录

历史与文化

契丹、沙子里、托克马克与怒江

——历史上的契丹及契丹人 / 3

契丹与高句丽关系考述 / 25

辽代“道”制辨析 / 37

辽代选官制度刍议 / 49

辽朝官员谥号赠赐初探 / 70

辽代佛学教育运行机制述论 / 80

古代蒙古人、契丹人的“唾”习俗 / 100

辽代康默记家族粟特族属考论 / 111

考古发现与研究

辽朝的城“坊”与城市管理

——以石刻文字为中心 / 141

北京地区辽代壁画墓 / 152

辽萧公妻耶律氏墓志铭考证 / 174

一个契丹化的辽代汉人家族

——翟文化幢考释 / 197

2 契丹学研究（第一辑）

从契丹—元朝故地图画雕塑文物看元上都等地的黑人 / 206

内蒙古开鲁县发现辽代琉璃砖皇族墓葬

——辽太祖“私城”龙化州城址位置基本确定 / 208

内蒙古巴彦塔拉遗址出土瓷器研究 / 212

文献资料研究

辽金女真的“家”与家庭形态

——以《金史》用语为中心 / 229

辽《吕士宗墓志》用典考论 / 238

语言文字

辽代的语言状况 / 259

契丹小字史料中的“失(室)韦” / 275

契丹字“春、夏、秋、冬”的释读历程 / 282

学术动态

刘凤翥教授的《契丹文字中的“横帐”》讨论文 / 291

《科举与辽代社会》评议 / 293

辽朝农业研究综述 / 299

《契丹学研究》稿约 / 308

参考体例 / 309

历史与文化

契丹、沙子里、托克马克与怒江

——历史上的契丹及契丹人*

任爱君（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契丹，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代民族，是古代北方民族历史发展序列中的重要一员。契丹人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大一统发展历程中的关键阶段。

契丹，不仅是一个古代曾经存在过的民族名称，也是中古史曾经存在过的一个强大的割据政权的名称，同时还是一个迄今仍在发挥着独特作用的、专门指称古代或当代地域的特有名词。说它是一个特有的名词，是因为迄今为止“契丹”一词，已经在各种文献中表现为四种基本形式，即 Kitan, Kitay, Katay, Katan。第一种形式 Kitan 是汉文、藏文和突厥文对契丹译名的转写，反映的是一个单数的形式；第二种形式 Kitay 是通过突厥语、拉丁文或俄文的转写，是用来对那时与现今“中国”的特指；第三种形式 Katay 是元由来华的基督教教士们采用的译写方式，是对契丹统治区域的专指；第四种形式 Katan 是个混合形式，仅见于北西伯利亚的某些方言，如芬兰—乌戈尔语的转写，用来指称当地的鞑靼人。一个固有的“契丹”语词或名号，实际上包含三重意义，即用来指称民族或人群的名称、用来指称固有的政权名称和专门用来指称固有的地域名称。这最后一种特指地域的名称的作用，即包含了对于固定的地域或国度的特指的意义，如俄语用它来称呼中国，还有

* 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契丹—辽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团队”基金项目成果。

植物学界也用它来命名一些与中国有关的植物品种。如 1954 年在广西临桂宛田圩村附近的原始森林——花坪林区发现的一种杉树的新品种，就被植物学家用拉丁文命名为 *Cathaya Argyrophylla*，汉语名是“银杉”，但拉丁文的命名直译为“契丹的叶片是银色的”，或“契丹树”。^①

因此，关于契丹人的历史及其作用和影响，值得学界深入探讨。

一、契丹史概说

（一）契丹人的历史

契丹人是对古代阿尔泰语系东胡族群历史文化的延续与传承，也是对于盛唐瓦解后的唐朝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契丹或契丹人的历史名号，最早出现于 4 世纪后半期。342 年前后，占据老哈河流域的盛极一时的宇文鲜卑部落，由于遭到占据辽西地区的慕容鲜卑部落的袭击，多数部众成为慕容部的属民，其残余势力遂逃匿于松漠之中。松漠，是北朝时期出现的地理名词，概指今大兴安岭西段以南、燕山山脉以东、努鲁儿虎山系以北、松辽平原以西的广阔区域。这是一处三面环山的半封闭地带，据文献记载：“登高遥望，平林漠漠”，属于拥有稀疏森林景观的丘陵草原地貌，故名为松漠。当时，生活在松漠地域内的宇文部残余人口，至 4 世纪末已形成一支部落联合体——库莫奚部落集团。388 年，北魏政权将军事攻击的矛头指向库莫奚。北魏军队取道滦源（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闪电河流域）东进，击败库莫奚于饶乐水（今内蒙古赤峰西拉木伦河上游）南，俘获其四部落及牲畜百余万头；又挥师追击，但在饶乐水北遭到库莫奚部落的伏击，惨败而归。^②这次战争，对于北魏政权是个教训，对于松漠诸部落却是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据《魏书》记载，登国三年（388）饶乐水之战，使契丹与库莫奚“分

^① 刘夙：《南国的契丹树》，见刘夙：《植物名字的故事》，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1—94 页。

^② 参见《魏书》卷二《太祖纪》，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2 页。

背”，双方从此走上各自独立的发展道路。^①这是契丹人历史的开端。

因此，根据文献的记载，契丹部落主要来源于宇文部，而宇文部又是1世纪以后，自阴山附近东迁至饶乐水及徒河流域的鲜卑部落。据出土的辽朝皇族出身的《耶律羽之墓志铭》记载：

其先宗分信首，派出石槐，历汉魏隋唐以来，世为君长。^②

现有关于鲜卑以及契丹早期历史的考古学资料，同样表明契丹人的历史文化传统延续了早期鲜卑文化的发展脉络。^③但是，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宇文鲜卑与阴山地带深刻的渊源关系，故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发现的众多鲜卑考古文化遗存中，也可以看到其中某些因素与契丹早期文化极为相似的基本特征，而且这些特征甚至在拓跋鲜卑平城时代的一些遗物中也同样存在。这是由鲜卑文化共同性所决定的，绝非成为否定宇文鲜卑传统的有力证据，这是不可以混淆的基本事实。^④鲜卑部落是古代东胡族系重要的一员，契丹文化对鲜卑文化的继承可以视为对于东胡族系文化传统的延续，譬如崇山拜日的习惯，不仅契丹部落保留下来，甚至还传承到蒙古等其他族系的风俗习惯中。因此，鲜卑人的历史和契丹人的历史以及蒙古人的历史，具有极大的共同性，学界同仁对相互间历史线索的探查可以做出勘验比证的尝试。契丹人和鲜卑人共同存在的“放偷日”习俗，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两翼制”（欧美学界称为“双王制”）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政治统治的传统，契丹人也不例外，蒙古人也是如此。因此，契丹人的存在和发展，客观上是对古代阿尔泰语系东胡族群文化发展的传统，并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奠定

① 《魏书》卷一〇〇《契丹》，第2223页。

② 《耶律羽之墓志铭》，转引自盖之庸：《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③ 张柏忠：《哲里木盟发现的鲜卑遗存》，《文物》1981年第2期；张柏忠：《科左后旗胡斯淖契丹墓》，《文物》1983年第9期；张柏忠：《内蒙古哲里木盟发现的几座契丹墓》，《考古》1984年第2期；张柏忠：《契丹早期文化探索》，《考古》1984年第2期。

④ 田立坤：《鲜卑文化源流的考古学考察》，见吉林大学考古系编：《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367页。

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不仅如此，契丹人在“因俗而治”的前提下，还将盛唐文化继承下来。以考古学发现为例，予以说明，像拥有巨大石室的耶律羽之墓葬和具有浓郁唐风壁画装饰的早期墓葬，还有在阿鲁科尔沁旗发现的水泉辽墓、宝山辽墓，以及赤峰市松山区境内发现的驸马赠卫国王墓葬等。1996年，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宿白教授考察宣化下八里辽代墓群后，曾经指出：宣化下八里辽代张姓家族墓地，仍然沿用唐人习见的“五音五行”的安葬方法（即昭穆葬法），甚至其墓葬形制、壁画内容和随葬器物大部分都可以追踪它的唐代渊源：

还有M2、M5、M10三座墓室顶部绘画天象图，由内二十八宿、外十二宫，或者内十二宫、外二十八宿组成，外围都还布置一匝十二时；这样的图像，正可和晚唐五代墓室顶天象之下的四壁上安排的十二时形象相衔接。综此，宣化张家墓地所提供的情况，更形象地表达了在契丹统治下的汉人生活仍沿陷辽以前之旧，他们较同时期的居于中原的北宋人家更多地保有胜朝遗风。^①

其实，这也正是置于中华民族历史大背景下的契丹辽文化的一大特征，是在不放弃自我的前提下，又整合与继承了唐朝文化根基的鲜明体现。

（二）契丹人的历史贡献

契丹人的历史贡献，第一是封建政治体制的创新。当燕云十六州纳入版图后，辽太宗将行政管理职责完全托付于投奔而来的汉族官员，保留了燕云地区既有的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同时，又宣布将契丹国号更改为“大辽”，皇都更名为上京临潢府，改南京东平府为东京辽阳府，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府，改年号为会同等。所谓“蕃汉分治”，其实就是将南、北两种政治体制

^① 宿白：《宣化考古三题》，见宿白：《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184页。

兼容并蓄。南方的政治体制即农耕社会的封建管理方式，北方的政治体制即游牧社会的封建管理方式。将原本两种对立交争不已的政治形态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框架内，这就是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并进而形成辽朝独有的南、北面官制度。这是辽朝“蕃汉分治”或“因俗而治”的基本内容。分治暂时缓和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对立态势，有利于稳定和发展，成为以后南、北政治合流的基础。

第二是基于“分治”基础上的南、北方政治体制的合流。所谓南、北方政治体制的合流，即契丹皇帝兼具皇帝的威仪和可汗的身份，而且在体制创新的基础上，影响后世行政区划体制的演变，即省制的形成。同时，辽朝的建立，还深刻地改变了古代的政治结构以及诸割据政权间平行交叉的政治边际关系、各自内部的社会组织结构的错位变动，尤其是政治边际关系的变化，如长城失去政治分界线的作用，而燕云以南及黄河西岸成为新的政治分界线。这种现象，势必会引起各自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如契丹本土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兼容，中原地区经济生产重心的南移。由经济结构的变化，刺激和改变着现实观念系统的变革。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慨叹：

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帐，北人不信南人有万斛之舟，盖土俗然也。今无碍矣！^①

风俗是由社会诸阶层共同创造的文化的整体。“风”是上层引导的现象，“俗”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主要形态。因此，高度根植于风俗基础上的社会观念形态，既是对自身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是最为顽固的存在，又是最容易被认知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外在表现。当辽、宋双方对峙之际，只有文化这种无形的东西悄悄地发生着浸润。伴随着双方在文化上的沟通，逐渐形成打破地理环境、生活方式与民族限制的更高层面的群体认同意识。

^①（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第三是契丹人的宗教信仰传统，既有类似萨满教的原始宗教形态，也有来自中原的道教，来自中原、来自西域的佛教，来自中亚的摩尼教和聂思脱里教派（即也里可温，又名景教）等。因此，辽朝境内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处于自由选择的发展状态，如辽承天皇太后与辽圣宗母子信奉佛教，而辽圣宗之弟耶律隆祐却独好道教。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契丹人信仰聂思脱里教派的证据，但辽朝境内已经存在聂思脱里派教徒却是不争的事实。契丹人的宗教世界观反衬着他们对社会与现实生活的态度。947年春，耶律德光在开封城郊外，听到杜鹃的鸣叫，就询问随从这是何鸟。随从答曰杜鹃，并引用杜甫的诗句予以说明。谁知耶律德光闻曰：

许大世界，一个飞禽，任其拣选。要生处便生，不生处种也无！此即佛经所云观自在也。^①

契丹人凭借内心的“自在”感觉来选择生活。他们将原本分立的佛教两大宗派显宗（即禅宗）与密宗兼收并蓄，倡导相互融通。辽圣宗调动国家力量编刻《大藏经》，辽道宗精研华严经典并亲自撰写修习精要《华严经随品赞》10卷；辽僧希麟在继承唐朝佛学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一部工具书《续一切经音义》，行均则撰写一部学习佛经的字书《龙龕手镜》等。

在这种相对豪放的情怀感染下，契丹科学技术也得到迅速发展。契丹人在吸收中原历法和天文学知识的基础上，发展出自身的历法和天文学观念。这在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中已有体现。北宋名臣苏辙出使契丹时，曾因冬至节气的推算而与契丹人交流，发现并纠正了北宋历法的错误。耶律俨还对古代的星命之学予以研究，完成一篇流传至今的星命之学总论，即《星命总括·序》。契丹人的纪年方式，不仅继承了中原以天干地支纪年法，还保留和传承了北方游牧民族以五行与十二生肖相搭配的五行纪年法。契丹

^①（宋）陶谷撰：《清异录》卷上。

人掌握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土木建筑技术与城市规划，不仅引进和出现了花园式的庭院建筑模式，还出现了比较先进的城厢结合的引领城市建筑的新潮流。契丹人的宫殿建筑技术，既保留与传承了古代中原的南北纵向中轴的建筑布局传统，也保留和传承了游牧民族习惯的方位观与东方定向的传统理念。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辽朝同样大放异彩，史书记载中许多的精绝技术及其产品，真实的样品许多都发现于辽朝故地。例如“花罗透背”、“细锦透背合线绫”等纺织精品，在乌兰察布豪欠营辽墓的发现中，提供了这些丝织品具体的纹样风格。据史料记载，商人贩运辽朝生产的“蕃罗”至中原，一出手即是“奇货”。但这种“蕃罗”，直到豪欠营辽墓发掘之后，人们才有幸目睹其实物：

在女尸身上只有一件轻罗衫，质薄透明，在现在各种最轻薄的丝织品中，没有一种能与它作比较的。

这件轻罗薄衫，正是“花罗透背”或“细绢透背”系列的样品。质料一流，应是当年奇货可居的“蕃罗”^①。这是当时辽朝在充分学习中原技术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具有辽朝特色的丝织品。宋朝《营造法式》记载了当时先进的木作、石作建筑技术，但“九脊小帐”的样品普遍地发现于辽墓。

（三）契丹人对周边地区造成的历史影响

1. 五代以及北宋时期“契丹样”流传中原

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大臣奏请禁止境内流行的“契丹样装束”。何谓“契丹样”？即由契丹本土制造的产品式样。其原文曰：

臣伏见天下鞍辔器械，并取契丹样装饰，以为美好。安有中国之

^① 王丹华：《契丹女尸的丝织品》，见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契丹女尸——豪欠营辽墓清理与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人，反效戎虏之俗？请下明诏毁弃，须依汉境旧仪。^①

这里所谓“并取契丹样装饰以为美好”，说的就是时尚。这句话有两重含义：一是以购买契丹样产品为时尚，二是盛行制造效仿契丹式样的产品。说明在“鞍辔器械”等方面的制造技术，契丹领先于当时的中原地区。但根据文献记载，最早对契丹物产表现出抵触与防范心理者，应是高丽王朝的建立者王建。史称：王建临终遗嘱的第四件事，即：

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②

此后，“契丹样”产品，仍然影响着中原地区的日常生活，并时常妨碍到中原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安稳。北宋时期，将契丹人生产的镔铁刀、鞍具（即后汉时期感到麻烦的“鞍辔器械”一类）等誉为“天下第一”。宋朝也为此不断地发布禁令，甚至明确规定不许出入境的产品范围。但是，“契丹样”仍然不断地影响着宋朝的社会生活。譬如宋人还将契丹人生产的“蕃罗”视为奇货，甚至连当时的高丽王朝也将契丹人生产的丝织品誉为“丹丝”，而倍加珍视。北宋朝廷为此曾屡次下诏禁止“契丹样”装束，如庆历八年（1048）诏令：

诏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③

契丹人的产品及其习俗习惯，已如风雨般洒落至周围地区，这是政治强制手段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宋徽宗也曾数次诏令禁止境内百姓人等穿用契丹

①（汉）许敬迁：《请禁断契丹样装束奏》，见（清）董诰：《全唐文》卷八五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73页。

② 郑麟趾：《高丽史》卷二《世家（二）》，人民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

③ 《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576页。

样服装，如头戴毡笠或妇女穿吊整裤等。但每次禁令颁布之后，不是出现新的风尚，就是被禁止的东西又悄然兴起。如汴梁城流行的时尚发式，有“大鬓方额”、“急扎垂肩”、“云尖巧额，鬓撑金凤”等。朝廷要禁断的物品，除“契丹样”的服饰外，还有契丹歌舞与民谣。甚至在两宋及金元之际，契丹歌舞仍然是当时的时尚品牌。北宋王安石曾经留下“涿州沙上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的佳句；南宋范致能也讴歌“休舞银貂小契丹”的曲词；“小契丹”已经成为辽朝歌舞的品牌性标志。元朝诗人张翥又以简练的诗句，为后人描摹了一副“老契丹”的典型样貌：“遮头犹戴狐皮帽，好个侬家老契丹。”

这些，已经形成一种比较突出的历史文化现象，而“契丹样”也正是契丹文化特点的直接物化的表现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时期由北方草原地区传入的契丹文化信息，在当今长江以南地区的考古发现中，也偶有表现。如湖南省新邵一座券顶圆拱砖室墓发现的一组北宋时期壁画，共有各种动物与人物图案40余幅；其中，既有三条腿的黑鸟，也有墓主人的肖像，“头戴黑色纱巾，身着黑色服饰。在其左右两侧，各站立着一位官员；在他的头部上方，两只凤凰高低盘旋、尽情嬉戏，一只凶猛的鹰在翘首张望”，“这些壁画是用赭色、黑色颜料在白色的墙面上描绘而成。据专家介绍，这些北宋墓室壁画带有北方壁画风格，有可能是古代北方人迁徙到此，在此定居后精心绘制的”。^①新邵古墓蕴含的文化信息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但壁画内容显示的北方文化信息，无疑与当时契丹文化传播存在密切的联系。

2. 宣示大一统意识，主动强化和凝固民族的政治向心力

契丹人建国之初，耶律阿保机就诏令立孔庙予以奉祀。天赞三年（924），阿保机大举征伐漠北诸部之际，又诏令扈从官兵：

取金河水，凿乌山石，辇至潢河、木叶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岳之意。^②

① 龙军、禹爱华：《湖南新邵古墓中发现罕见北宋壁画》，《光明日报》2009年11月7日。

② 《辽史》卷二《太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页。